



田老师本名田钟洛，更响亮的是他的笔名袁鹰。《人民日报》社的老少同事都亲切地称他“老田”。只有我多年尊称他“田老师”，因为他是我名正言顺的研究生导师，也是我人生的导师。

久仰袁鹰先生的大名，也读过他的儿童文学作品和散文。而和他相互认识是1985年秋天，我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系之后。系里要给新生调配导师，我上的新闻业务班主要是为《人民日报》培养编辑记者，导师也从报社有正高职称的编辑记者中选派。田老师将要离休，本来不打算带研究生，因同学的母亲与他是报社的几十年的老同事，请他带自己的女儿，他同意了。系里跟田老师商量，带一个也是带，带两个也是带，他也同意了。于是还没找到导师的我被搭给了田老师。后来才知道，田老师为人厚道，很少拒绝。第一次见到田老师是在10号楼二层东头儿他的办公室，眼前是一位温和的长者，用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和我们闲聊，亲切而随意，不经意地问了问我们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是哪里人，并说他上班时间都在这里，可随时来找他。

在社会上有广泛影响的是作家袁鹰和他的《井冈翠竹》等散文名篇。而田老师主业是多年主持《人民日报》的文艺版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人民日报》文艺版用整版篇幅刊发了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三天之后

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陶铸追悼大会，为陶铸公开平反。《人民日报》头版刊登长篇评论赞扬上海工人宗福先创作的话剧《于无声处》，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鼓与呼。作为文艺部的负责人，袁鹰先生签发这些文章和版面，有承担风险的勇敢和历史的担当。党史专家龚育之曾写道：“文化大革命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全党酝酿和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人民日报》积极地、勇敢地推动和引领了拨乱反正、全面改革的潮流，走在伟大历史转折的最前头。”袁鹰先生无疑是这一时期《人民日报》优秀团队的骨干，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有特殊贡献的。

袁鹰先生担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的那些年，正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文艺勃兴的年代，那时的报刊不多，《人民日报》的文艺评论版和大地副刊是评论家和作家的重要园地，一流作家的一流作品在这里刊登，文艺新人的处女作在这里发表。田老师为人真诚，待人和善，发掘优秀作品，奖掖青年才俊，那时几乎整个中国文艺界都是他的朋友，如今六十岁以上的著名作家至少有一半是袁鹰先生和人民日报文艺版的作者。

我多年在全国各地采访，听说我是《人民日报》文艺部的，总有人说：“代问袁鹰先生好。”

1986年春夏，我在文艺部实习，在田老师领导下工作。每周都去旁听室里的例会。那时的会议室很简陋，

水泥地的大房间，中间摆着一张乒乓球桌，田老师和几位副主任坐在桌子的四边，其他人则从自己办公室抬把椅子坐在屋子四周，最年轻的多坐在门口，我坐在门外。例会很有意思，田老师主讲，大家都可随时插话，如同事大农所忆：“老田跟大家谈形势、谈工作、谈宣传口的风向，如聊家常。大事奇事，在老田云淡风轻，而是非去从，听者判断。”记得有一次田老师随中国作家代表团从菲律宾访问归来，穿着一件两侧镂空钩花的马尼拉衬衫，被大家笑称他穿得跟马科斯夫人一样。田老师不笑，说：“真的很凉快。”

田老师给我派的第一个活儿，是替工作忙走不开的他去烟台参加首次全国儿童文学创作会议。会后去跟他谈会议情况，他嘱我写一篇述评。我写完交给组长，组长说，你直接给老田吧。实习生的稿子交给主任，自然惴惴不安。不一会儿田老师拿着他修改后的稿子给我，我仔细看了看，他修改的不多，改了几个字，添了几个字，改的是差错，添的是画龙点睛之笔。几天后，述评在文艺评论版刊发，这可是我第一次在《人民日报》发表上干字的文章。

写毕业论文时，报社老同志建议我写五十年代《人民日报》主导的电影《武训传》批判运动。田老师仔细给我讲了他所知道的运动的始末，并谈了他认为的这场运动对中国社会的重要影响。写好初稿后，我请田老师审读，他阅后跟我说，主题比较清楚，文字也顺，但两三万字的文章有两百多注释没有必要，能自己简单说明白的话不必引文加注，一是有吊书袋的感觉，二是让读者看着不方便。又说，文中的断语和结论太多，应该多讲事实，把前因后果说清楚，不要轻易下结论，让读文章的人有自己的判断。此后几十年我写文出书，都一直遵从田老师的教诲。

研究生毕业时，我妈要我给田老师送点礼，我说报社不兴送礼，我妈说我不懂事，从家里翻出一瓶五粮液，要我带到北京。我拿到田老师办公室，他一再说不能要，见我执意要放下，又连声说：“无功受禄，无功受禄。”

田老师安息。

## 告别敬爱的田老师

袁晞

## 泪别袁鹰

咸高军

9月1日是个伤痛的日子，是您永远离开我们的日子。我还像往常一样站在校门口等待孩子们新学年归来，想着利用晨读，让孩子们好好温习您的《小站》《渡口》《白杨》《黄河的主人》《井冈翠竹》；还寻思楚州实验小学建校97周年校庆纪念日时，集团第八届“袁鹰作文奖”应该启动了；还在惦记着，还有50多天，您的百岁生日就要到了，我得准备一个大大的寿桃呀……

可是，我怎么会想到您在这一天离开我们呢，离开无数喜欢您作品的读者呢，离开您长期资助、关心关爱的家乡福利院的孩子们呢。

泪眼蒙蒙，往事历历。此刻，我的脑海中全是您的影像，全是您的慈祥，全是您热爱家乡、关心家乡后辈的一幕幕。

2009年10月10日，我在北京朝阳区金台西路第一次拜访您。您精神矍铄，伸出温暖的手与我相握，连声说，欢迎！欢迎！在您极其简朴但书香四溢的书房里，您听我汇报家乡的情况。当我告诉您，楚州实验小学新校区已经建设，您祖父田鲁玙先生参与创建的江北慈幼院事业一直在传承时，您陷入对往事的沉思，打断我的话说：“江北慈幼院由银行家谈丹崖、周作民、朱虞生等发起创办，由祖父具体操办。说真的，祖父当年已经不小了，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老有所为，发挥余热吧！”您还说，那时，你不到十岁，经常跟着祖父在江北慈幼院内玩，认识了不少教工和学生。尤其记得当年的校医刘树龙挽救了不少孤儿的生命，赢得了人们的赞扬。这些年来，您一直有个想法，希望家乡能为孤残儿童开个绿灯，就像当年江北慈幼院那样，办个食宿全免的学校，让他们免费接受教育。说到这里，您欣然题词：“发扬江北慈幼院精神，办好新时代教育。”

您在淮安作家《窗外风景》的序中写道，您这个淮安的儿子，离开故乡八十多年了。离家时才十岁，后来，远离故土，先后在浙江、上海、北京等地求学、工作、生活，听到有关故乡的只是片言只语，对故乡现在发生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淮安那高大严整的城墙姿影，至今还留在脑海里。儿时就听长辈说起：淮安府的城墙，同扬州府一样，是全苏北地区最好的城墙。记得除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外，南北还有两座角楼，担负着运河畔的瞭望任务。当年民间曾流传一副有地方特色的趣联：“南角楼，北角楼，南北角楼望南北；东长街，西长街，东西长街买东西。”如今，东西长街还在，南北角楼跟那道城墙早已夷为平地，只能在梦里去“望南北”了。印象很深的还有府衙的那副楹联：“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旧时代竟有如此有胆识之士，在堂堂府衙上作如此掷地有金石声的宣言，今天读了，仍令人敬佩而且敬畏。您还说起淮安城里那些具有文化底蕴和历史风尘的巷子：驸马巷、麒麟巷、双桃柳巷……还有凡办喜事人家花轿必定要绕道走一次的多子巷，不知如今尚存否？最难忘的是北门内的窦娥巷，传说是《窦娥冤》主角的故里。那窦娥是淮安历史上可以和梁红玉齐名的女性名人，她的冤案感动上天，六月飞雪，由元代杂剧名家关汉卿写成《感天动地窦娥冤》，流传至今，感动了、教育了一代代观众和读者。想起古代淮安人以这个冤死的弱女命名她住过的巷子，实在叫后辈敬佩之至！

与您交谈，唤起您许多遥远的记忆，让我切实感受到您梦中流淌的是浓浓的乡情、乡愁。

此后十数年来，我几乎年年看望您。您特别喜欢孩子，所以，我每次去，都带上几个家乡的少年儿童，给您祝寿，聆听您的教诲。勤的时候，我一年去五六次；即使工作再忙，也坚持每年一次。

每次看到您用手紧紧拉着孩子们的手，一刻也不放开，一边与孩子叙谈，一边用慈祥的目光看着他们，我总想说：孩子们真是您的心头肉啊。每次离别，您都说，不急不急。您多想与家乡的孩子们再交流一会儿啊。当我们真的要离开时，您会赶紧拿来自己的作品或是其他作家写的书，有时也会拿出我们新近编写的《元音童唱》，取出签字水笔或是毛笔，写上“某某某(看望他的孩子的姓名)好友”“袁鹰敬赠”等字样。看着您的字，拳拳关爱的气息扑面而来。您听说家乡学校拟用您的名字和您夫人吴芸红的名字创办文学社，很高兴，但坚持提出，文学社不用您的名字命名。您说，承受不起。在我们一再坚持下，您勉强同意以谐音的方式为关天培小学题写了“元音童唱文学社”，以吴老在《新少年报》工作时联系小读者的称谓——“咪咪姐姐”中的“咪咪”为山阳小学题写了“咪咪文学社”。这样的题签显然是看家乡孩子们的面子，是勉励后辈勤于习作，不断写好作文。否则，以你们做人的准则，是万万不同意的。

印象最为深刻的是2021年，我带上了仇宇和盖娜美两个孩子去看您，您非常高兴，早早地坐在书桌前等我们。其实，我知道，这几年，您很不容易。自2014年不慎摔倒导致股骨颈骨折后，您大多时间都躺在床上，因年纪大，未能治愈，偶尔下床，也只能靠助步椅艰难挪步。这几年，您打包将您的著作和一些名家的著作赠予家乡小学，陆陆续续，已有数十次。其中，除您自己不同时期出版的著作外，不乏巴金、冰心、曹清华等名家珍贵的签名书，而且每本书的扉页上都有您亲手盖的“袁鹰敬赠”这样一枚朱文方印。为了培养孩子们的作文兴趣，您还捐赠了20万元设立袁鹰作文奖基金。尤为感人的，颁发袁鹰作文奖时，每一张证书，您都签上自己的名字。在得悉家乡作协召开代表大会时，卧床养病的您，不顾高龄，写来贺信：“故乡胜迹，运河帆影，长在梦中闪现，遥望古城，不胜依依。祝故乡文星闪耀，文气浓郁，文华飘香，文韵繁荣！”其华灼灼，其情切切，其心悠悠。

“病卧依稀思古城，巨资襄助设书宸。生平擘画千秋事，泽惠童蒙逐梦成。”可谁想到，一别成永远。您答应我们的：在身体好一点的时候，回淮安看看。如今，您的心愿终成我们的遗憾。



郭红松 绘

来开导日超，这让旁听的我也受益匪浅。日超可能就是通过多次拜望名家大家从而达到了提升眼界和境界。后来袁老又亲切地问我他的情况。我简要地告诉他，我就在北京工作，学的是财经，为企业提供服务。那时的我，尽管已经写作出版过24部财会实务类书籍，但是在文学方面，我仅创作并保留了不足100首的诗稿，散文稿一般写的都是短文，既未发表，又未出版，在我的心里总觉得拿不上台面来说，所以当时我没过多介绍自己。

后来，好友曾多次给我讲起了袁老心系家乡文学青年，提携文学新人成长的那些事，他还提倡写短文，让我受到极大的鼓舞。因为有了这次机缘，我对袁老更加关注了。我的书架上，袁鹰散文专著不断地增加，其中有我特别喜欢的《留春集》《袁鹰散文六十篇》《京华小品》等几部代表作。后来得知，袁老提倡写短文。何为的《第二次考试》起先有4000多字，被袁鹰改成2000字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又被拍成电视，何为一举成名。

## 我与袁鹰的一面之缘

张洪兵

我最初知道袁鹰，是语文课本中有他的文章《井冈翠竹》，这让我知道他是个了不起的作家。可是，我没想到今生竟能有幸与袁老面对面交谈。细算起来，这事距今已有10年了。那年夏天，淮安本土作家赵日超打电话给我，说他已到北京，拟在第一时间拜望袁老先生，问我有没有时间一起去探望老人家。那天我正好与妻子在她好友家作客，听到这个消息，我顾不上吃饭，当即就驾车前往了。在我到达约定地点时，好友日超已等候多时，在匆忙中，我随他一起来到了袁老的家。

袁老一家人高兴地把我俩让进了客厅。当日袁老家有袁老及其爱人，女儿，侄儿，共四口人。袁鹰四方脸，身材魁梧，头发花白，他频频地向我们挥手，表达着一种谦和。我们因为是老乡，这时就感到格外亲切。我真没想到，袁老那时已是91岁高龄，尽管他动作有点迟缓，可是精气神尚好，两眼清澈明亮，思路敏捷，记忆力很好，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形象。

在简短寒暄后，日超和袁老聊了一些老家的时事，接着又谈论起日超的第一本散文集《窗外风景》文稿和袁老给“周恩来红军小学”赠书的事。在谈论散文集文稿时，遇到日超与他的观点和意见不一致时，袁老总会用启发式的建议